

人类奇迹：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启示录

中国聚焦

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(记者王建华、吕梦琦、张文静、马姝瑞)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奇迹。她如期兑现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庄严承诺。

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,数量相当于欧洲总人口的贫困人口群摆脱贫困,其中,最近8年达9899万。

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,给全人类的减贫事业提供了至少十个启示。

——精准

脱贫3年多了,75岁的山西岢岚农民刘福有还珍藏着自家的扶贫手册,上面详细记载着贫困数据和帮扶措施。

“这是我家的脱贫史,不能丢。”他说。

在中国,每个贫困户都有这样一本小册子,它展现着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一个创举——“精准扶贫”。

按照新理念的指引,中国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,建档立卡,逐户逐人进行贫困分类。

“中国做到了真扶贫、扶真贫、真脱贫。”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说。

——可持续

64岁的闫映山不担心返贫。他将16亩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种植黄花,一年稳挣3万元。

闫映山所在的山西大同云州区是黄花种植基地。“不会回到从前了。”他说。

返贫现象是人类反贫困斗争中的一个顽疾。中国探索出可持续的脱贫之路,“小黄花、大产业”式的案例比比皆是。

中国还及时谋划全面脱贫后的衔接战略。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。

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表示,有效衔接,是“可持续”的一个力证。

——共享

让贫困人口分享发展成果,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议题。

2019年,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高级领导人卡西姆·苏里率团考察江西婺源扶贫经验并找到了答案。

那里蓬勃的乡村旅游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齐备的社会服务,令他印象深刻。



他感叹,共享理念值得世界借鉴。

2016年到2020年前三季度,中国每个贫困县可支配财政扶贫资金年均超3.6亿元。

——举国行动

2015年11月,中西部22个省市区党政“一把手”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。这是中共十八大后唯一一项由党政“一把手”向中央立下军令状的工作。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共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,而全部脱贫是其标志性成果。中共十九大还将“精准脱贫”确定为三大攻坚战之一。

53岁的安徽岳西龙井村党总支书记汪功义,清晰记得四年前全县三级干部决战脱贫攻坚誓师大会的壮观场景。

他说:“为了实现全面脱贫,中国动用了举国之力。”

——目标导向

安徽大别山腹地的毛河村,57岁的徐加来度过了搬入新家后的又一个春节。

去年他家的收入超过2万元。“今年会更

好。”徐加来说。

5年前居住在仅有13户人家的高寒山村,徐加来曾哀叹“好日子无门”。

之后,他和村民们搬入山下新居,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“立志”脱贫,靠技术含量高的特色种植和护林护路全部脱贫。

“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”,这是中共作出的一以贯之的庄严承诺。

——系统性

“7年前,我领了1只‘扶贫羊’,现在已增加到60多只了。”安徽利辛县脱贫户周亚军受益于发“羊”财。

他还获得2.5万元补贴改造了房屋,久病的妻子享受“健康扶贫”后看病吃药已不是负担,一双儿女上学费用也被减免了。

“少了任何一项帮扶政策,我就不能脱贫。”周亚军说。

产业帮扶、医疗救助、教育扶贫、易地搬迁、就业培训、社会保障……中国成功构建起系统完备的“零盲区”脱贫战略。

拒绝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,坚持系统施策、标本兼治,中国向全球展示了深刻的脱贫哲学。

——责任体系

从高层到基层,层层压实责任,确保政策执行到位,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“利器”。

一张至今仍在互联网上流传的“五级书记同框”看脱贫的照片,形象地展示着中国强有力的脱贫责任体系。

中国建立了中央统筹、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负总责、市(地)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,形成了“五级书记抓脱贫、全党动员促攻坚”的领导责任体系。

实施精准扶贫后,全国共有25.5万个驻村工作队、290多万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先后奋斗在第一线。

“正是层层压实责任,才啃下了全部脱贫的‘硬骨头’。”山西省临县县委书记张建国说。

——一类一策

甘肃通渭县黑石头村村民王建忠终于摘

掉了“穷帽子”。依托企业在村里发展的育苗基地,他种的3亩金银花一年收入2万元以上。

这是产业带动脱贫无数成功案例中的一个,但是并非所有贫困人口都适合这条路子。

中国采用分类施策的办法,拓宽脱贫路径,设计出“发展生产脱贫一批、易地搬迁脱贫一批、生态补偿脱贫一批、发展教育脱贫一批、社会保障兜底一批”的脱贫策略。

87岁的山西河曲农民李二不郎曾是黄河纤夫,他通过社会保障兜底,每年领取低保、养老金和高龄补贴等共约9000元,得以脱贫并安享晚年。

“贫困多维性需要治理多元化。”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章文光说。

——基础设施先行

建造基础设施,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先行物质保障。

中国最后一个具备条件通硬化路的建制村——四川布拖县阿布洛哈村现在每天都有客运班车往来。尽管从千年闭塞中被唤醒仅8个月,但这里已是一派生机勃勃。

被认为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已经脱贫,崭新的易地扶贫安置小区、宽敞明亮的农村校舍、蜿蜒延伸的山区公路,永久抹去了一个个贫困印记。

仅在2012年至2019年间,中国贫困地区就新建建道路约5.9万公里,“出门水泥路,抬脚上客车”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
此外,全国还建成了1100多万亩农村安全饮水工程,以及通达的电网和通讯网。

——区域协作

100多年前,从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,曾给甘肃定西贴上了“苦甲天下”的标签。

100多年后,水韵榕城结对帮扶旱塬定西。

扶贫车间,香菇大棚。2017年以来,福州先后投入逾11亿元帮扶定西,并派出近600名干部和技术人员,“生根开花”的项目达700多个,惠及贫困人口73万多人次。

脱贫户高吉太说:“穷日子不会再有了!”

中国创造性地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、定点帮扶机制,县县都有扶贫点,村村都有工作队,调动起全社会各方力量聚力扶贫。

“富裕地区定向帮助贫困地区,是全国扶贫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之一。”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说。

摆脱“贫困陷阱”,只因“穷在深山有远亲”

“穷在深山无人问”,在中国曾经是无人不晓的俗语,也是千百年来穷苦百姓得不到外力帮助,在“贫困陷阱”中自生自灭的宿命。

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,进入新时代,“贫困陷阱”注定不再是穷苦百姓的宿命。随着穷山沟里迎来一波波的“远亲”,摆脱“贫困陷阱”的时候到了。

本报记者张典标、蒋成

住在县城新房里,回忆起两年前的一段往事,高玉珍一脸惭愧:“我险些把上门的亲戚赶走了!”

高玉珍的旧家,在贵州毕节市纳雍县董地乡联和村。精准扶贫前,毕节是典型的深贫地区,董地乡更是贵州20个极贫乡之一。

高玉珍说的“亲戚”,是驻村扶贫干部。那时,他们一遍一遍地动员高玉珍搬迁到县里的安置点,不厌其烦地向她描绘新房子新生活。然而,高玉珍和丈夫杨文国信不过这些外来面孔。虽然夫妻俩也知道,守在穷山恶水的联和村,永远也过不上好日子,但穷怕了的人,对搬离故乡也天然有一种恐惧,“去了城里,水泥地上怎么讨生活?”

如今,不仅“讨”到了生活,而且过上了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生活,高玉珍发自内心的感谢那些动员、帮助她家搬迁到县城安置点的“亲戚”们。“过年前,我想给这些远方的‘亲戚’快递点土年货,可他们说啥也不让!”

“远亲花名册”

搬下山之前,高玉珍和乡亲们喝的是望天水,走的毛狗路,住的是茅草房,种的是偏坡地,吃的是苞谷饭。望天水就是雨水,毛狗路是崎岖不平、窄得只容得下毛狗(狐狸)走的山路,偏坡地是挂在喀斯特石山上的薄地。

高玉珍说,住在山沟沟里,怎么折腾日子都不见好,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,只有山里的回音。靠亲戚朋友?他们自己都顾不过来。

这正像《穷穷的本质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:



广州天河区组织纳雍劳动力到天河区务工。受访者供图

贫穷就像一个陷阱,让深陷其中的人无法逃离。此书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·班纳吉和埃丝特·迪弗洛,他们指出,身处“贫困的陷阱”,如果没有外力帮助,很难摆脱困境。

“穷在深山无人问”,在中国曾经是无人不晓的俗语,也是千百年来穷苦百姓得不到外力帮助,在“贫困陷阱”中自生自灭的宿命。

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,进入新时代,“贫困陷阱”注定不再是高玉珍们的宿命。随着山沟沟里迎来一波波的“远亲”,摆脱“贫困陷阱”的时候到了。

在纳雍库东关乡李子村,扶贫特岗金丽把这些“远亲”都记在了“村级远亲花名册”上:村里的扶贫车间是民革中央援建的,通村通组路是省里出钱修的,危房改造用的是广州天河区的资金,观光旅游有广州企业的功劳……金丽掰着手指一个个数,从中央到省市,从县到乡镇,从东西部扶贫协作到社会企业帮扶,一下列出20个“远亲”。

金丽说,其实各个“远亲”干的事并不能区分得一清二楚,更多的时候是共同出力干好一

件事。比如搞养牛,牛圈是广州天河的企业建的,养殖技术和管理是民革中央支持的,产业资金是市里出的,土地是驻村干部协调的。

纳雍县副县长宋邦达手里还有一本“县级远亲花名册”。宋邦达说:“在脱贫攻坚的路上,纳雍并不是孤军奋战。纳雍县有四方面‘远亲’:第一是民革中央,发挥的是民主党派联系广泛和智力优势;第二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深圳和广州,发挥的是前沿城市先进的发展理念和经验优势;第三是中央和省市相关定点单位、企业,不仅提供人力物力,还一起推动落地;第四是社会企业,共同形成协同一心的亲戚网络。”

宋邦达介绍,近年来,这些“亲戚”总共向纳雍县派出600多人帮扶队伍,共计投入、引来帮扶资金超过10亿元,涉及产业、教育、基础设施、劳务输出等多个方面。

“多亏了这帮‘远亲’,一个时代结束了。”在纳雍猪场乡洞口村,曾经的贫困户王云飞感叹,“过去小伙子唱的是,小妹我想你在心头,家穷无法把你勾,说的不是害羞话,我家锅瓢

碗盏在外头;而现在他们唱的是,走路不湿鞋(方言发‘孩’音),吃水不用烧,烧火不用柴。”

有些扶贫干部结束帮扶离开后,村民还一直惦记着。他们被纳雍人亲切地称为“大姐”“金花”“校长妈妈”。

“结亲戚”方法论

主动“攀”高玉珍这个“穷亲”的人有十来个。有省里市里的,也有县里乡里的,还有从北京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等地大老远跑来的。

罗珍玉是董地乡党委书记,也是高玉珍的帮扶干部。

“攀亲戚并不是通水管,一通百通。更像是解乱线团,一个结接着一个结,每个结都很重要。”罗珍玉总结说,上门一次,贫困户的顾虑就消除一点,帮扶一次,贫困户的信任就多一分。

纳雍玉龙坝镇岩脚村的老黄,脱贫攻坚开始时家里还没通电。驻村干部伴着狗吠,上门给老黄立电线杆,接线通电,老黄像和自己没关系一样,都懒得搭把手;工作队帮他修了牛圈,他还是不搭理人;最后帮扶干部手把手教他打扫庭院,他才喝止住了狗吠,拿袖子擦了擦板凳,招呼帮扶干部坐下,说了一阵掏心窝的话。

民革中央派驻岩脚村的第一书记艾岩说,光“攀”老黄这么一个亲戚,驻村干部就前前后后去了几十次。

当岩脚村的驻村干部们把“毛狗路”一段段变成水泥路的时候,原本观望的村民,争着投工投劳,生怕自家赶不上;那些质疑的人,到了最后甚至穿着解放鞋就冲进地里,抢着干。驻村工作队员李健成记得,路修好之后,老年人吧嗒着烟斗,一副满足喜悦。小媳妇们赶紧去买新鞋,赶场串门都穿着,小伙子比着买摩托车,中年人则纷纷买了农用三轮车。

有一回,李健成听到乡亲们在新修的路边闲聊,“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,这些和咱不沾亲不带故的干部,可比亲闺女还好”。听到这句话,李健成一阵温暖流过心头。

一家一户磨嘴皮,一桩一件抓落实,外来的“远亲们”逐渐打开局面。

“贫困户其实很怕被瞧不起。想和贫困户攀亲戚,就别高高在上嫌弃他。多到贫困户家里串串门,别怕椅子脏,也别嫌递过来的碗破

旧。”在金丽看来,攀亲戚的第一步是理解和尊重这些“穷亲戚”。

“远亲”帮“滚山鸡”变成了“脱贫战斗机”

结成了“亲戚”,也有摩擦、红脸的时候。

去年4月,受疫情影响,纳雍几十万只“滚山鸡”遭遇滞销难题。广州市天河区驻纳雍扶贫协作工作队通过直播带货打开了“滚山鸡”在广州的市场,解了纳雍县“滚山鸡”产业的燃眉之急。

“滚山鸡”在纳雍的山林间摸爬滚打,吃起来肉质清香香甜,过了老广的“舌头关”,可发货却出现发错单、没卖相、新鲜度不够、大小不一等问题。这些影响销售的问题,本地人觉得无所谓,认为外来的帮扶干部小题大做了。

“第一步没迈好,‘滚山鸡’的牌子就砸了。”广州市天河区驻纳雍扶贫协作工作队队长邹学飘有点恨铁不成钢。直到被严厉提醒之后,“滚山鸡”产业带头人刘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,开始规范屠宰和发货流程。

“摩擦、红脸,都是为了在走之前多教我们一些带不走的本事。”刘健说,“直播带货之后,天河区派驻纳雍的工作队继续倒逼‘滚山鸡’产业升级,不但引进广东企业帮助延伸产业链,开发出鲜鸡之外的深加工产品,还帮助‘滚山鸡’进入大湾区菜篮子。”

原来养鸡只为盐巴钱。现在纳雍每天供应一万只“滚山鸡”给大湾区,每年销售额1.2亿元,成了“脱贫战斗机”。

在邹学飘看来,帮扶并非完全是“远亲”单方面付出,而是一个双赢的过程。

以广州天河和纳雍为例,一方面,纳雍脱贫摘帽,学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理念;另一方面,纳雍的优质特色产品也源源不断供应粤港澳大湾区。粤港澳大湾区的干部更对三农有更真切的认识,知道怎么和农民打交道,学到了贫困地区干部毫无怨言的奉献精神。而广东的企业进入纳雍投资,既推动了纳雍经济发展,也为粤企提供了商机。

在自身的努力和“远亲”的帮扶下,去年11月23日,包含纳雍在内的贵州最后9个未摘帽贫困县脱贫,意味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清零。